

延河边的 文人们

朱鸿召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延河边的 文人们

朱鸿召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河边的文人们 / 朱鸿召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2

ISBN 978-7-5473-0106-7

I. 延… II. 朱… III. 革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0518 号

延河边的文人们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0.2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06-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在20世纪中后期,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而尤其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你将永远也挣脱不了与延安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意识到没意识到,它都客观而又化入主观地存在着。也可能正因为它已经由认知客体附着生成为行为主体,融入了你的精神思想,成为你的血肉生命,你时时刻刻都在呼吸操持着它,才不能觉察到它确切的客观存在。

老实说,我开始进入这个课题研究时,对此,也只是一些朦胧的感觉。随着我对课题研究的深入——通览了延安时期几乎所有的新闻出版物,搜罗了尽量多的当时当事人的回忆录,走访了历史的旧迹,查阅了有关文献档案,我的心灵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和冲击。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致力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历史研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始终处于急剧动荡之中,思想潮流,文化运动,基本上每十年一个周期。而在所有这些潮流运动中,组织最严,程度最烈,声势至大,影响至深的,不是发生在城市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出现在黄土地上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势造英雄,20世纪中国的真正英雄,也不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而是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红色延安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是20世纪世界潮流的东方漩涡。激流汹涌,击水三千,情怀是它,残酷是它,光荣属于它,黯淡属于它。延安时期已经规范中国历史50年,还将制约中国至少50年。延安整风运动后,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由混沌到有

序,由繁杂到清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复归于传统文人的社会角色。

本书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切入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描述。我努力遵循着两个态度:其一,述而不论,述而少论;其二,言必有据,据必作注。这绝非学究气息,而是感觉到这十年的历史内涵太沉重了,褒贬臧否,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和环境似乎还不成熟。与其率尔以对,矫情浮躁,不如存而不论,温和虚静。西哲有言: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宽容的理解,正是温雅的品性。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我是越写越沉重,越写越激动。激动或可抑制,沉重却是无法减轻。有几位亲近的朋友,从不同的层次阅读了清样稿,他们都带着浓厚的阅读兴趣一口气地读下去,读后又都感到心里沉重得很。对此,我除表示深深的歉意外,并不想作什么改动。但愿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沉重,只有在众人的精神分享和心灵承担中,才能融入命脉,化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阳刚血性,钢铁脊梁。

此言已奢,就此打住,恭候更多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朋友的意见。我的电子信箱是 E-mail:zhuhongzhao@vip. sina. com。

引言：肤肉恩施

延安，旧称肤施。

延安的地标性建筑是嘉陵山上的古塔。此塔最初属于唐代佛教建筑。佛传尸毗王在嘉陵山隔延河相望的清凉山修行之时，遇老鹰捕食小鸽。双方矛盾纷争中，请求尸毗王调解。面对生物链上的两难矛盾，尸毗王割肤肉喂饱老鹰以解救小鸽；一说尸毗王赶走老鹰，割肤肉喂养小鸽。总之，尸毗王是通过肤肉恩施的善行，以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化解矛盾，息事宁人。肤施之谓，得源于此。今天的清凉山上，还有圣迹可寻。

1

当我徜徉在清凉山上，延河岸边，寻觅着抗战(1937~1945)前后奔



20 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拍摄的延安老城，屋舍俨然，街巷纷呈，宝塔颓废，延河水流丰沛

向延安的中国文人的踪迹,追问着活跃在 20 世纪中叶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肤肉恩施,这个源自北魏时期的佛传故事,正是一个不朽的象征——尸毗王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延安文人的精神缩影。

延安文人,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汇集在陕北一隅的较为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此前中国文人社会角色的继续,又是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开端。中国知识分子,旧时俗称文人,雅称为士。其外在的一般特征是识字读书,而其内在的精神品质,是作为社会的道德良心,担当着文化传承,涵养着民族精神,肩负着无可逃脱的家国意识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使命感。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了,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成了自由的飘忽不定的社会阶层。处在 20 世纪初期风雨飘摇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主要起着调剂中西方文化的时代历史落差的文化移介作用,担负着为民族思考出路的历史使命,引领时代发展的步伐。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以宗法制为特征的所谓封建道德伦理,家的意识淡漠了。随着半殖民地中国命运的加重,国的意识更增强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感召下,他们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社会,也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文化传统,将个人浮沉与政党事业,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目前的非常时期,在内部表现出不断的内战和严重的天灾,在外部是民族敌人得寸进尺的加紧侵略,然而最吃紧最重要的,还是民族被侵略的危机。”非常时期,需要非常行为,非常价值观念,非常道德准则。“妥协,投降,固然要认为是和民族敌对的思想,就是主张忍让和平的观念形态,也认为是在事实上帮助了敌人的。每个民众应当有自动地积极地起来救亡救国的意识……少数的个人虽然在串通了敌人的情形之下,得以苟且荣耀,然而大多数的个人的出路,是和民族的出路分不开的”^①,那就是追求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统一的理想世界。于是,在应付战争的外力压迫和苏联经验的引导下,形成了延安文人置身权力外、

^① 艾思奇:《非常时期的观念形态》(1936 年 1 月),《艾思奇文集》,第 1 卷第 298~29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7 月版。

体制里、思想中的特殊身世和尴尬处境。并且,经过整风审干的思想改造、精神清洁运动后,他们都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淡化消褪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内在的特殊精神秉性。他们深信,真理只有一个,并且真理已经找到,这是方向,是出发点,也是衡量一切的准绳。“正确的理论的光辉照到哪里,哪里就发出了光亮。如今留给我们来做的不再是摸索道路而是如何开步走。”^①不幸的是,他们并不能如愿地走得从容、自在、自信。十年过后,1957年反右运动重复了一次延安文人的经历。又一个十年过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重复了延安文人的遭遇。而延安文人在这后两次历史的复演中,几乎没有不被批判和打倒的。

马克思在谈论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研究方法时,引用生物学原理,“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②。所以,如果将20世纪中国历史倒过来看,那么,延安文人的心路历程,延安文人命运的惊心动魄之处,便更为显明。今天,我不禁疑问: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他们,以及作为他们儿孙辈的我们引向何处?这个问题,“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③这构成我观察思考延安文人命运浮沉,以及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个视角。但在本书叙述过程中,仍然大体按时间顺序,围绕延安文人的形成、特点、精神、理想;延安文人与政党政治的矛盾、磨合;延安文人的身份、地位、处境;延安文人的思想改造、精神清洁、意识形态重建等问题来展开。书中所论述的文人,主要指到延安之前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兼论及在

① 何其芳:《杂记三则》(1942年8月),《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31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③ [英]冯·哈耶克(F. A. Hayek):《通往奴役之路》,第13~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

延安接受高等教育的广大青年学生,以及其他文化人。

在我的观念中,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处在社会体制之外,更像西方话语中的知识分子^①;而进入到政党政治及其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之间,则更似中国传统的士人、文人。由于时代的要求,他们又要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这是往俗的方面走,便称:延安文人。

延安因为文人而走向新中国,现代文人因为延安而步入历史。

① 19 世纪末西方关于“知识分子”定义中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富有强烈道德动力的作家,用通俗的语言向一个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参见罗伯特·S. 博恩顿(Robert S. Boynton):《新一代知识分子》,《交流》季刊(美),1996 年第 1 期。

目 录

自序	1
引言：肤肉恩施	1
第一章 奔向延安	1
1·1 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	3
1·2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16
1·3 亲吻着圣地的热土	33
第二章 圣地如斯	45
2·1 战时共产主义理想国	46
2·2 心中黄河歌如涛	59
2·3 纷繁的文事	77
2·4 在不能安身处安心立命	93
第三章 清洁精神	113
3·1 与己无关的整风	115
3·2 与己有关的“讲话”	129
3·3 不可或缺的牺牲	144
3·4 从整风到审干	163
3·5 从审干到抢救	177

第四章 走出延安·····	192
4·1 劳心者与劳力者·····	193
4·2 精神的家园·····	210
4·3 走不出的起点·····	224
 附录一 外国文人在延安·····	 239
附录二 延安文化活动大事记·····	255
附录三 关于“党内斗争为什么这么严酷”的通信·····	289
附录四 关于设立“延安学”的学理依据·····	295
 初版代后记 访学千里到延安·····	 302
后记·····	313

第一章 奔向延安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①

——莫耶

1

战争改变了一切。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众望所归。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

① 莫耶词、郑律成曲:《延安颂》(1938年)。收入《抗战名曲100首》,第133~13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

莫耶(1917~1986),女,原名陈淑媛,生长在厦门鼓浪屿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就发表文艺作品,曾在上海女子书店任职,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随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到西北,同年10月奔赴延安,进入抗大三期、鲁艺文学系一期学习,应音乐系学员郑律成之约,创作歌词《延安颂》。1938年底,参加鲁艺师生抗日前线采访队,深入晋西北,并留在120师战斗剧社工作。1942年3月,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描写革命队伍里的“老干部”与投身抗战的女学生之间婚姻风波。1942年9月,整风运动中她因此成为主要斗争目标。此后,1947年审查阶级出身运动,195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7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她都被当作批判斗争对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彻底平反昭雪。

郑律成(1914~1976),原名郑富恩,朝鲜人,1933年到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1937年10月到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毕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音乐指导,1939年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1年底,与丁雪松结婚。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回朝鲜。

向延安。“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像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①此情此景,蔚为壮观。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②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科技人员大会召开,“有理、工、农、医等高、中级科技人员三四百人参加”。^③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参加合影人数为104人,其中文艺工作者为97人。^④

截至1942年,全边区中等学校学生人数1828人,高等教育共培养造就2万多各类人才(其中包括短期培训人员)。^⑤另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⑥其流失的1万余人中,大多数是奔赴延安的。

1943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时说:
2 “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⑦依此推算,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7600人。1944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⑧大体上是吻合的。

① 杨作林:《自然科学院初期的情况》,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8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 数据来源: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内文字介绍,朱鸿召1996年5月现场采集。另见刘煜主编:《圣地风云录》,第87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5月版。

③ 屈伯川:《延安自然科学院》,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55页。

④ 数据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展览大厅图片,朱鸿召1996年5月现场采集。

文艺工作者人数由艾克思提供,见苏一平、艾克思:《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回顾》,收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360~361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艾克思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64~365页,列出详细名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黎辛:《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对此略有增减。见《新文学史料》(京),1995年第2期。而高浦棠(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对上述名单做了更详细的考证,是迄今最缜密的研究成果。见《作品与争鸣》(京),2007年第5期。

⑤ 牛防、康喜平:《陕甘宁边区人口概述》,《延安大学学报》(延安),1992年第3期。

⑥ 李锐:《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见《窑洞杂述》,第13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⑦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⑧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1页。

综合上述各种说法,按不同层次计算:延安(含陕甘宁边区)共有各类各级知识文化人大约4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1万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100余人。

1.1 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

延安文人是个较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大致可归纳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

以思想罪、政治罪而被逮捕、监禁的现代中国文化人,其绝大多数都会在,也只能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强烈。在政治、道德一元化的社会里,被捕坐牢便被视为异端,难于相容在那个旧有的社会秩序之中。走出牢门,“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哪里去投亲靠友啊?”^①遇上动荡的历史年代,这些叛逆的文人便由政治的反叛,进而走上道德的反叛、社会的反叛、文化的反叛。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是第一个到保安的文人,也是最著名的延安文人。早在中学时期,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②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软禁南京。1936年9月逃离南京,经上海、西安,于同年11月到保安,成为第一个奔赴陕北革命队伍的现代知识分子。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



丁玲初到陕北,进入延安,精神振奋,情绪激昂

① 黄药眠:《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侧影》,《新文学史料》(京),1979年第2辑。

②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5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萱,出身于云南腾冲县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同盟会会员,曾任蔡锷护国军秘书长。1926年艾思奇在昆明参加学生运动,险遭军阀逮捕,乔装打扮,取道越南,来到苏州。次年到达南京,因其兄李生庄是东南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共产党员,艾思奇被国民党误以为其兄而被捕。保释出狱后去日本,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其间回昆明短期养病,稍后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专业,但志趣在哲学。“我总想从这里(欧洲哲学,引者注)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愤而返国。1934年先后在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挥部和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主持“读书问答”和“哲学讲话”,进行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探索。1936年1月,在读书生活社出版《哲学讲话》单行本,不久,遭国民党政府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之罪查禁。又更名《大众哲学》出版,到1938年,两年间印行10版(次);至1948年,共计印行32版(次),影响甚广。1935年10月,艾思奇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一起被组织调往延安。

范文澜(1893~1969),是延安文人中最年长的一位。浙江绍兴人,早年受业于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侃)先生,经学造诣颇深。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文史研究。192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加入共产党,开始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学史。1930年、1934年两度被捕,均被营救获释。^②1937年到河南大学任教,并于卢沟桥事变后参加新四军游击队。1940年1月,由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安排,范文澜进入延安。

柯仲平(1902~1964),出身于云南省广南县一个中等景况的家庭。1921年底与丁桂媛(月秋)从昆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私奔至北京。

① 参见陆万美:《回忆艾思奇同志在〈云南民众日报〉片断》,见《一个哲学家的道路》,第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2版。

② 参见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收入《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1926年转至上海,加入“创造社”出版部,于国民党查封该出版部时,与叶灵凤、周毓英、成绍宗一起被捕。保释出狱后,因为生计辗转榆林、西安、北京等地。1929年回到上海,参加“狂飙社”。“狂飙社是由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组合起来的文学团体,靠办刊物写文章来养活自己。谁也没有工资,大家穷得叮当响。1929年,丁月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莉莉,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丁月秋在三友实业社当了缝纫工人,柯仲平到建设大学当了教授,教新兴艺术课,讲《革命与艺术》。得来的钱由月秋做饭,哥儿们大家一起吃。”^①



柯仲平在延安,积极倡导朗诵诗,热心民众戏剧,脱下清纯学生装,相伴美髯、美酒和美女。这是诗人早期照片

不久,因“宣传赤化”再次被捕。出狱后,1930年3月经潘汉年、陈为人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底,为准备南京路游行,第三次被国民党上海巡捕房逮捕,入江苏第二监狱、苏州反省院监狱。三年后在友人和家人集资营救下,保释而出。

斯时,丁月秋因误会已改嫁,柯仲平到了日本。1937年8月回国,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坚决要求到延安。董必武让他在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又一次遭国民党特务追捕。这年11月,组织安排他到了延安。

塞克(1906~1988),原名陈凝秋,河北霸县人。19岁时,“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到处流浪,当过医院的抄账、更夫、文书、教员,画广告,讨饭为生,坎坷贫困的生活养成他倔强、孤僻的性格”。^② 1927年,在上海加入“南国社”,稍后出关到东北。1930年,任哈尔滨《星光报》副刊主编,因刊发《欢迎北伐军进驻武汉》一文,与社长、主编同时被捕

^①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第10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7月版。

^② 周而复:《时代的歌手——忆塞克》,《新文学史料》(京),1990年第4期。

入狱。营救获释后,随东北流亡作家又入关,来到上海,参加“狂飙社”演剧部和救亡演剧第一队工作。1938年10月,经武汉到临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年底,到延安,先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担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生于哈尔滨。祖父辈从山东青州逃荒到东北,父亲是个泥瓦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舒群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奔赴抗日前线。1934年逃亡青岛,被捕。^①获释后,来到上海。1937年离开上海,经南京、西安,到武汉、桂林,参与创办《战地》一刊。1940年,由共产党组织安排进入延安。

艾青(1910~1996),本名蒋正涵,号海澄。1929年到法国留学,因为浙江金华的地主家庭断绝了供给,只得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习绘画,并涉猎文学与哲学。“我就像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②1932年初回国,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学家联盟”。因参与创建“春地美术研究所”工作,7月,被国民党上海巡捕房密探逮捕。当局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三年又三个月后出狱,先后足及常州、上海、杭州、临汾、西安、武汉、衡山、桂林、重庆等地。在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讲课时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③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希望能够到“山那边去”。1941年3月来到延安。

与叛逆者同行而汇入延安文人群体的是逃亡者,声名的逃亡与失去故土的逃亡。

周扬(1908~1989),1937年8月与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起由党组织决定从上海调入延安。这是“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因此,我在那里(上海,引者注)的工作很难做。……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

① 董兴泉:《舒群传略》,收入《舒群研究资料》。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② 艾青:《我的创作生涯》,见《艾青谈诗》,第25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③ 参见肖云儒、高杰:《奔向延安》,《文学报》(沪),1992年4月30日。